

西南交通大学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年 级 二〇〇五级

作者姓名 蒲 娟

学科专业 专门史

指导教师 鲜于浩 教授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西南交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

近代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研究
(1840-1919 年)

年级	二〇〇五级
姓名	蒲娟
申请学位级别	硕士
专业	专门史
指导教师	鲜于浩 教授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Classified Index: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Thesis

Research on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in Sichuan Area
in Modern China
(1840-1919)

Grade:2005

Candidate:Pu Juan

Academic Degree Applied for :Master

Major:Special History

Supervisor:Xianyu Hao

Dec 19, 2007

西南交通大学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交通大学可以将本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印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 不保密□，使用本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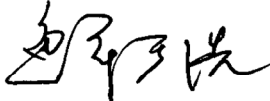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指导老师签名：

日期：


2007.12.27.

西南交通大学学位论文创新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本学位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对近代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会教育、教会医疗等事业进行了梳理，并以史实为依据分析其特点，再透过传教事业分析帝国主义最终的经济、政治目的。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川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水陆交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四川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同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四川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本身作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即是对近代（1840年——1919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分别作了梳理，归纳其特点并分析其原因。首先是对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概述，四川地区天主教的控制权大部分时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把持，其传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基督教两百多年，并在此持续发展；传入四川的基督教则主要是以英美等新兴资产阶级为支持，虽然发展时间上相对要短一些，但发展势头却后来居上，特别是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其发展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其次分别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教育和医疗是教会传教的主要手段，对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这两部分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所办学校和医院等史实作了梳理，并以历史史实为依据，总结了在四川地区教会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点以及对四川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四川地区的教案以次数多、规模大、赔款重而闻名全国，因此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主要教案分别作了叙述并归纳其特点。最后总结了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并从宗教和政治外交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所谓传教事业并非简单的文化侵入，其背后必然是以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关键词： 天主教 基督教 近代 四川地区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both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society and exerted enormous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Sichuan province, despite its remot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inconvenience in land 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for missionizing, in which both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had actively developed their charity business like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Meanwhile, court cases also happened frequently in Sichuan area because of inevitabl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vading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onvention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religious school,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are distinguishing in some particularities. The dissertation aims to firstly demonstrate their activities in Sichuan area and then point out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stinction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 as well.

In the first part, the dissertation reviews their developing histories in Sichuan are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catholicism, mainly controlled by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was introduced into Sichuan 200 years early than christianism, while the latter, supported by the rising anglo-american bourgeois, was developing rapidly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aking the leading scale and influence when entering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second part, the dissertation reviews the church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services by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in Sichuan area, which were two main missionizing measures and played great influence on local area.

Especially, the dissertation lists all the church schools and hospitals founded by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ries to points out their characters and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o Sichuan society.

In the third part, the dissertation specially discusses the court cases happened in Sichuan area, which are famous for its high frequency, large scale and mint indemnities.

In the last part, the dissertation tries to explain th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their activities in Sichuan area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christ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igio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t is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missionizing activity imported by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is not only for its cultural purpose but to seek their greate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o make China their colonies. So, the studying of this topic is significant and valuable whether in its academic or realistic senses.

Keywords: catholicism christianism modern China Sichuan area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前言.....	1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2
第 2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述.....	4
2.1 天主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况.....	4
2.1.1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川发展概述.....	4
2.1.2 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鸦片战后至 19 世纪 90 年代).....	5
2.1.3 进一步发展时期(20 世纪初).....	5
2.2 基督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况.....	6
2.2.1 考察时期(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6
2.2.2 创立与初步发展时期(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	7
2.2.3 巩固发展时期(20 世纪初).....	7
2.3 小结.....	8
第 3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事业.....	10
3.1 天主教在川主要教育事业.....	10
3.2 基督教在川主要教育事业.....	10
3.3 四川地区教会教育特点分析.....	13
第 4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医疗事业.....	20
4.1 天主教在川主要医疗事业.....	20
4.2 基督教在川主要医疗事业.....	20
4.3 四川地区教会医疗事业特点分析.....	21
第 5 章 近代四川地区教案.....	26
5.1 近代天主教在川主要教案.....	26
5.2 近代基督教在川主要教案.....	27
5.3 近代四川地区教案特点分析.....	29
第 6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川传播差异及原因分析.....	33
6.1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	33
6.2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川传播差异原因分析.....	34
6.2.1 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天主教与基督教之差异.....	34
6.2.2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分析:英美与法国对华外交策略的差异.....	36
结论.....	41
注释.....	43
致谢.....	50
参考文献.....	5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55
声明.....	56

第 1 章 绪 论

1.1 前言

基督宗教发源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后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基督教会于 1054 年分裂为两个教派：以罗马主教为中心的一派自称“公教”，即我国所称“天主教”；另一支以君士坦丁堡主教为首，自称“正教”，即我国所称“东正教”。16 世纪，德国、瑞士、荷兰、北欧和英国等地发生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产生出脱离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即中国所称的“基督教”。本文研究的对象即是上述，基督宗教的两大重要派别：天主教与基督教。

深处内陆的四川，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滞后，但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较之于中国其它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40 年天主教即传入四川并一直持续发展，近代开埠以来，法国逐步取得保教权，因此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基本由法国传教士掌握，来华的修会主要有：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和遣使会。而在罗马教廷授权之下，四川的天主教传教事业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独揽，四川地区的天主教也因其活动时间长，教徒多，范围广，影响深而颇具研究价值。

基督教传入四川的时间则相对较晚，1876 年入川后相继有包括内地会、卫斯理宗、安立甘宗、浸礼宗、公谊宗、信义宗、门诺派、五旬节宗等 30 多个差会到四川传教。

天主教与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渗入四川，再加上其背后必然的政治目的，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民众冲突发生教案，其中以天主教尤为激烈。另外，教育与医疗传教一直被看作是重要的传教方式，就四川地区而言，天主教进入时间较早，医疗事业开端较早，但规模与影响不及基督教，世俗教育更是落后于基督教。基督教从入川时间上晚于天主教两百多年，但其发展速度与影响却非前者可比。就医疗事业而言，自 1877 年英国内地会在重庆巴县设立第一家诊所以来，发展迅速，美以美会、内地会、英美会、公谊会、浸礼会等教派的传教士和医生在各城镇建医院、诊所和药局，开办医学校，陆续带来西医书籍及器械，使西方医药科学技术在相对落后的四川广泛传播，推动

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西医药事业的发展。就教育事业而言，建立了四川历史上第一所教会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并重视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为传播西方科学，推动近代四川的进步在客观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教案与教育、医疗传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内容主要涉及四川汉族地区而不包括甘、阿、凉等少数民族地区，时间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即1840年到1919年，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近代四川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重要活动地之一，在国内对二者也有一些著述，如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宗教志》，对四川省内天主教和基督教情况有一个概括性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华归主》和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主要是对四川基督教的研究而并未涉及天主教，其中《四川基督教》一书，梳理了各宗派、各教会、各机构的基本情况，提供了四川基督教最为基本的教会史料，毫无疑问是研究四川基督教史的重要参考书目。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是对清前期天主教入川传播情况的史料记载。近年来的重要著作即是秦和平先生著《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和《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另外还有主要涉及四川教案的，如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张力著《四川义和团运动》、张力、刘鉴唐著《中国教案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教案》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姜丽的《从〈华西教会新闻〉看近代四川基督教医疗事业》，主要是利用教会刊物《华西教会新闻》侧重对基督教医疗事业的研究，龙伟的《传教士视野中的 20 年代四川基督教运动》是对 20 世纪 20 年代基督教发展情况的研究，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涉及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国外有，（日）铁山博《评“大足教案”和“顺清灭洋”》，《清末四川的半殖民地化与仇教运动——以大足仇教斗争为中心》，主要以大足教案为研究对象。

另外还有，刘稚旖的《简论近代西方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秦和平的《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和《清代中叶四川官绅士民对天主教认识之认识》、刘君的《清代四川外国教会述论》、权小芹的《重庆地区的天主教及其建筑文化》、邓卫中的《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陈建明的《基督教华西浸礼会在四川地区的传教活动》、杜懋圻的《鸦片战争前的四川基督教》、刘斌《近代四川天主教会述论》、任乃强《泸定大教堂》、唐毅的《四

川反洋教斗争概说》等文章对四川地区天主教或基督教发展情况都有所论述。

第 2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述

2.1 天主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况

2.1.1 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川发展概述

在基督教各宗派中，以景教入川活动为最早。远溯唐代，“635 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大德’（主教）阿罗本（Alopen）自中亚携经来到唐都城长安（今西安）”¹。景教传入四川约在公元八世纪，《能改斋漫录》中对当时景教在四川所建教堂有这样的记载：“石笋，在街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珍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²。公元 845 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主要打击对象为佛教，景教亦受牵连逐步在四川地区消失。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景教其实并非天主教，只是由于某些教义与天主教吻合而在最初被误认为是天主教。近代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这一点被逐步澄清，但在天主教内也有人称景教为天主教的“入华先驱”。

元代，元世祖时，天主教也曾盛行于中国各地，流传至四川，元亡以后亦即消失。

明代，1640 年（明崇祯十三年），葡萄牙耶稣会会士利类思抵成都开教，“居东阁大学士刘宇亮邸，并建筑屋和教堂，他是第一个到四川传教的欧洲人”³。1641 年利类思在四川成都为三十人“付洗”，其中多为达官显贵，皇室后裔，这是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 年葡籍耶稣会士安文思抵四川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

清初，1660 年“许纘曾任四川参政，承母意建堂于成都”⁴。1699 年遣使会士毕天祥（Ludovicus-Antonius Appiani）、穆天尺（Joannes Mullener）抵华，在广东学习中文后，于 1704 年到四川重庆传教。另两位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升（Jean Basset）和梁宏仁（Jeans-Francois de la Baluere）到成都传教。1753 年教皇本笃正式将四川的传教权“授予”巴黎外方传教会，此后四川的天主教教务逐渐为该会独揽。至雍正年间，四川境内教徒从 2500 人发展到 8000 人。这期间虽已为禁教时期，但传教活动仍转向农村，山区和边远

地区等继续开展,再加上湖广等省教徒的迁入,此时的教务仍发展迅速。1765年教徒增至 6000 余人,1769 年 12000 余人,至 1809 年(嘉庆十四年)增至 56000 人,占同期全国教徒总数的 26.12%,居各省首位。⁵此时,天主教在川传播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全家集体入教,世代相传下来。巴县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巴县何深海,合室老幼大小,三代相传习教”。⁶这一时期,随着天主教的传入,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西医西药随之而来。西方传教士普遍以送药医病的方式传教,在山区农村设立诊所,使用西医西药。外国传教士利用传教之便,收集四川各地地理、物产、民风、交通、经济等各类资料,将四川介绍到了国外。

2.1.2 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鸦片战后至 19 世纪 90 年代)

1846 年道光弛禁天主教,并发还康雍乾禁教时期没收之天主堂,这标志着对天主教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禁教的正式解禁,但外国传教士仍不准擅入内地传教。鸦片战争之前,我国西南的云贵川被归为一个大教区,以四川为中心。战后,由于清政府的弛禁政策,使内地天主教势力迅速恢复,云南、贵州先后脱离四川,自立教区。1856 年四川本部教区第一次划分为三个教区,即川西北、川东南、西藏教区。如《天主教川南教区创立纪录》记载,“分配给川西北教区的教徒约有 29000 人,川东南教区 21000 人,西藏教区 19000 人”。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清政府公开的“保教”政策之下,天主教在四川的发展更加迅猛了。据《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⁸四川各地也相应设立“洋务局”,护送洋人出入各地。1860 年 12 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德里入川传教,所持护照这样写道:“自此以后,传教士白公在四川省内往来传教居住,勿论何处租卖田地,建造天主堂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当以宾礼相待,……以示和约章程永垂不朽”。⁹70 年代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进一步为传教打开了西南门户。到 1887 年,四川有天主教徒 87400 人,约占全国的 17%,次于直隶,排列第二位。¹⁰这一时期,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教士干政、教民横行,与地方百姓官吏发生严重冲突,教案频发。

2.1.3 进一步发展时期(20 世纪初)

19 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天主教在华势力,天主教也改变了一些传教的政策和方法。例如,开展“全家归主运动”鼓励教徒引导尚未信教的

邻里亲戚朋友入教、约束传教士的言行、扩大举办慈善事业等等。1901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四川有传教士124人，信徒93623人，建有教堂221所，学校425所，医院10所，药房180所¹¹。1910年有传教士241人，天主教徒11万余人¹²。

20世纪初，四川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仍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把持，而该会向来刻板、保守，信奉直接的“福音”传教，一直比较忽视教育、医疗和文字等辅助手段的运用，也缺乏掌握相关知识的人才，而难于应付新的形势变化。因此此时天主教其他修会应邀入川，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s），本笃会（Benedictines of St. Odile），赎世主会（Redemptorists），奥斯定会（Order of St. Augustine），多明我会（Dominicans）等来川从事教育医药工作。这一时期迎来了四川天主教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时期。以川南教区为例，在1900~1910年间，教徒净增57%，与前40年（1860~1900年）的增长量基本持平。¹³川东、川西北教区，天主教徒从1911年的112870人增加到1916年的141830余人。¹⁴

2.2 基督教在四川地区发展概况

2.2.1 考察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日益合法化。1844年《黄埔条约》使得清政府被迫取消禁教；1858年《天津条约》准许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且为基督教传教争取到了与天主教同等的权益；1860年《北京续约》中又规定外国传教士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特权，给基督教传教士进入四川铺平了道路。1868年英国基督教会伦敦会牧师杨格菲（Dr.Griffith Joth）和大英圣书公会的伟力（Mr.A.Wylie）进入四川，遍游全省，对成都等各大城市进行考察，为以后各差会进入四川做好准备。1875年美以美会派青年牧师克阿林和史密斯到重庆考察，做传教的准备工作。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英国获得“驻寓”重庆特权，也为外国人进入内地提供了安全保障，基督教在内陆开展活动从可能成为现实。

2.2.2 创立与初步发展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1877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祝名杨经湖南、贵州进入重庆。同年5月英国内地会麦卡悌（Rer.Johnm Carthy）牧师经万县来到重庆，开设四川省第一个布道点。此后相继有美国的美以美会、安息日会，英国的公谊会、圣公会、浸礼会、英美会等差会先后来四川开辟传教地区。1881年内地会首先将成都开辟为传教地。随后几年相继发展到保宁（阆中），巴州（巴中）等地。据《中华归主》记载，这个时期基督教入川传教的主要修会如下：

1881年美以美会韦廉士、鹿依士牧师来到重庆，租房建堂；1891年该会将成都开辟为第二传教区。

1888年伦敦会进入重庆开始传教工作。

1889年英公谊会传教士陶维新由陕西经广元进入潼川，受阻后，于1890年正式在重庆开展传教工作。

1889年底美浸礼会进入宜宾，建立四川第一个浸礼会传教基地；四年后进入乐山、雅安；1921年成都教区成立。

1892年英圣公会经重庆到成都，两年之后才在中坝、新都、绵州、绵竹、安县等地寻得立足之地。

1892年美道会进入四川，先在成都租四圣祠北街民房数间作为布道所；1894年该会在成都建第一座礼拜堂（四圣祠北街礼拜堂），后发展至乐山，并在乐山建立教会印书馆一处。

在传教的同时，各差会还积极创办教育、医疗和慈善等事业。1877年英国内地会牧师麦卡悌在巴县城（今重庆市中区）设立诊所，在四川开创了使用西医技术和西药的历史。1887年美以美会女传教士轲立亚在重庆戴家巷开办了四川第一所女子小学。美以美会医生马家礼于1892年在重庆戴家巷开办了第一所医院，即宽仁医院。1896年英美会在四圣祠创办了第一个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婴儿。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于1894年在重庆创办求精中学，开西南各省新学之端。¹⁵但这一时期的发展仍十分缓慢。

2.2.3 巩固发展时期（20世纪初）

进入二十世纪，形势骤然变化，教会得到了迅速发展。

义和拳运动期间，四川部分民众对于义和拳成员的愚昧无知、笼统排外、滥杀无辜等行为感到非常痛心，“我们川省，动不动造些谣言，便要闹教，没见识的还说他是义民。却不想这些义民，平日只是拉肥猪抢童子的人。”¹⁶义和拳的种种行为，让民众为之失望，“说的话是扶清灭洋，做的事是杀人放火”，

再加上政府当局对西方教会的保护，民教矛盾有所降温，并减少甚至避免教案的发生。同时清政府多年来的惨败，也使民众正视了西方的强大，开始接纳西方文化，而对西方的教会也从反对走向容忍，甚至开始正视和接受。

另外，历经民众运动冲击的基督教会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调整传教方式，以文字传播、医药治疗、教育影响等为重点。1899年华西各传教会在重庆首次召开宣教师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创办华西教会月报，成立华西圣教书局和华西差会顾问部。该顾问部的成立为协调各差会关系，使布道工作顺利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各地纷纷开设福音堂、讲道所，开办学校等，增大西学宣传、医药治疗的力度。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于是在川传播新学的基督教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携手合作，成立“华西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管理教会学校工作，编撰教材，制定教学大纲，统一考试标准等，充分利用教育培养人才，扩张自己的影响，谋求更大发展。1907年，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和大学，成为成都周围一千英里内的唯一教会大学。1910年开始，先后成立了成都、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该组织在男女青年中开展各种活动，提倡科学及新式教育等，在社会中增强了影响力。

此外，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清政府保证严禁民众从事仇教活动，并将其与地方官员的升降罢黜相联系，制止了部分官员变相支持民众酿成教案的做法，减缓了矛盾激化。

据重庆海关的报告，1891年川省有新教传教士75名，教徒521名，其中内地会最大，有传教士48名，教徒420名。但之后十年间发展迅速，1901年传教士达191名，教徒达7902名，较之十年前分别增加2.5倍和15倍。¹⁷《中华归主》里有这样的评价：“本省各差会共有七十六所总堂，仅少于广东、江苏二省。但粤、苏两省小差会甚多，致力于特别事业之差会代表也不少，因此，就实际布道工作而论，则四川当为全国中总堂数目最多，布道工作最好的一省。”

¹⁸

2.3 小结

从以上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入川传播的历史线索的追溯，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天主教入川的历史很长，但其真正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却与基督教一样，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而这均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伴随的外交政策直接相关。事实上，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四川已拥有七大教会势力，计外国传教士175人，所办医院、药房等慈善机构13处。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据1901年12月重庆海关华特森给总

税务司赫德的统计表所载，法、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九大教会在四川共计男女教士315名，教堂221所，教徒共约101520人，共建医院、药房、学校、孤儿院、救济院等673处。这个时期基督宗教在川的发展可谓繁荣至甚。

同时可以看到，虽然基督教入华以及入川传教的历史远远短于天主教，但发展却非常迅猛直至超过了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在梧生的《排外与仇教》中有这样一段评论：“法人所经营之天主教……最早来，而其传播范围亦广。其后，英美人所经营之福音教……其势骏骏与天主教抗，信徒日增而未有艾”。¹⁹从1901至1909九年之内，以入川教士为例，法国教士增长率不及3%，英国超过52%，美国约为37%。²⁰虽天主教势力仍在继续增长，但英美等国教会势力却后来居上。据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对在川外国教会的统计，在十三个外国教会势力中，天主教只占四个，其教士数量分别为：巴黎外方传教会146人，公信会5人，圣教会1人，公谊会31人，共183人；而基督教会占了九个，教士数量分别为：内地会104人，美以美会45人，浸礼会33人，英美会81人，安立甘会37人，永安公会22人，基督教会5人，伦敦会4人，监督会1人，共332人。²¹

第 3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事业

3.1 天主教在川主要教育事业

天主教入川之后，开办了一些经言学堂，传播教理，传授教规，但对世俗教育始终不够重视，曾有这样的规定：“教徒子女未学好教义和教会经言以前，不得在国家学校念书；教会学校不得设语文，诗经、易经亦视为禁物”。²²直到20世纪初天主教为了适应形势变化，改变封闭状况，才面向社会开办世俗教育。

在目前所能查询到的国内相关文献中，对天主教在川创办的学校的记述非常有限，主要见诸于《四川省志·宗教志》中的记载：

中学

重庆明诚中学（1912年）

小学

乐山公信小学（1915年）

宜宾公信小学（1915年）

永川兆曙小学（1918年）

师范学校

明诚男师范学校，1911年由川东教区贾龙神父在重庆曾家岩创建，学校招收新生60人，学员学成之后，派往各处天主堂设立的学校任教。

法语学堂

1899川东教区法籍神父在重庆办法语学堂，1903年招收新生40名；

1904年叙府教区创办法文学堂，学生毕业后介绍到邮电局及滇越铁路局工作。

3.2 基督教在川主要教育事业

1、华西教育会

基督教在华教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教育会，于1905年11月在第五届年会上通过了在华西设立分会的决议。华西差会顾问部于成都开会，成立了“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与“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以筹办教会中小学、师范学校和教会大学。1906年，“小学和中学联合委员会”改组为“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简称“华西教育会”，而“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则改组为“华西协合大学理事部”，意在统一西南地区各教会学校，联合创办一所大学，左右四川新式教育的发展方向。该会负责统一指导及管理各派的学校，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编撰教育计划，编写教科书，出版教学刊物，确定考试标准，评定考试成绩，统一颁发毕业证书等。华西教育会即成为西南地区基督教教会教育的领导核心，将教会教育纳入有序的组织管理之中，联合集体的力量，使办学规模得到提升。

2、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1910年由四川基督教英美会，美以美会，浸礼会和公谊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稍后，1918年圣公会加入。美国传教士毕启（教育家、文学博士、神学博士）出任首任校长。学校创校之初，仅设文理教育三科。1914年增设医科，1915年设宗教科，1917年设立牙科，使之成为我国最早设立牙科的学校。1919年扩展为牙学院，由加拿大英美会派遣的LINDSAY博士担任院长。他先后邀请西方颇富盛名的牙医博士来到华西讲学，使得牙科迅速发展扩大，在教学和临床医学方面成为中国牙医学的先驱，在一些领域甚至还超过了西方的牙学院，被誉为“东亚第一牙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就开始接收来自苏联朝鲜，印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成为我国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单位之一。华西协和大学堪称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现代医学发源地。

3. 中学

1919年以前基督教在四川创办的中学，主要有成都私立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成都私立华英女子中学，重庆私立精益初中，成都私立华美女中，重庆私立求精中学，遂宁私立精一中学，资中私立进德女中，重庆私立广益中学，绵阳私立育德中学。

重庆求精中学

1891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在重庆曾家岩一带购得土地，开办学堂，初名求精高等学堂，开西南各省新学之端。²³辛亥革命后改称求精中学，学制为旧制四年。该校校规很严，学生一律住校，男女学生均有统一制服，在校生都要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学校重视体育活动，英语教学成绩突出。

重庆私立广益中学

1894年由英国基督教公谊会传教士在重庆创办，最初称广益书院，后改称广益中学。学校对学生管理严格，校内学习风气浓厚，英语教学突出，体

育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尤其是足球在校内广为普及。1900年该校开辟了西南地区第一个足球场，组织了西南第一支足球队，经常参加校内外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界的冠军队。²⁴

4. 师范教育

1906年华西教育会在成立年会中，“即议及基督教徒教员之供给问题”，“预备设男女师范各一”。经过筹划，1910夏，潼川、南川暑期师范学校开校，组织短期培训在岗教师。教育会设于成都的华西协合男子师范学校也于是年正式开班。1914年，又开设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学制二三年，专科学历。第二年即开始招收高小毕业和初中或同等学力者，进行一年或两年的小学师资训练。1916年有7人毕业，1917年毕业8人，1921年毕业30人。1915年，师范校增设幼稚师范科后，小学内设立树基幼儿园，作为幼稚师范科学生实习场所²⁵。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于文正科中附设教育科，学制六年，本科学历，美国传教士华雷士曾写文直接指出其办学的目的“盖为养成视学员、教育行政员、师范教员、中学校长而设者也”²⁶。

5. 特殊教育

英国圣公会差会干事斐成章出于对聋哑人教育的热爱，也是基于“基督从未忘记这些聋哑儿中的任何一个”的宗教信仰，1918年在绵阳县城黄家巷开办了一所私立盲哑学校。这是四川省最早的一所盲哑学校。当时一般老百姓都难以理解盲哑人如何接受教育，再加上本身对传教士的一些疑虑，学校最初只招到学生4人，年龄在12岁到18岁。盲人教员王汉臣（湖北黄冈人）亲手制作图表，编撰教科书，开设语文，算术，历史，音乐，写字，圣经等课程。直到1921年学校迁至汉州（今广汉市），该校三年内培养学生已达30人²⁷。

6. 女子教育

成都华美女子中学

1884年美国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柯立亚在重庆戴家巷开办一所女子小学，是成都私立华美女子中学的前身，这也是四川最早的女校，开全川女子教育之先声。²⁸1898年该校迁至成都陕西街29号。1908年开办旧制中学。该校学风严谨，学校风气浓厚，课外活动生气勃勃，常开展歌咏，演讲，辩论，英文话剧等活动。

成都华英女校

1896年基督教英美会女布道会传教士在成都开办华英女校，1914年创办旧制中学。

达县福音小学

1912年,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来到达县,开办小学,学校最初名为福音女子小学,开办工艺班,招收十五六岁信徒女子十余人学习针线和文化知识。1914年后开始招收小学生。学生除学一些启蒙的古文教材外,还开设圣经课。大班学生每月下午做两小时针线活,如做抽花枕头,手帕,打毛线,勾花边等,由英国人执教。²⁹

3.3 四川地区教会教育特点分析

1. 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和管理模式

从管理体制上讲,不少教会学校借鉴了西方学校中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规章制度比较齐全,建立了一套高效、有序的行政管理体制。

以基督教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为例,它由参与办学的英美会、美以美会、浸礼会等5个外国差会联合组成董事部,总部设在国外,作为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华西协和大学进行宏观管理,并提供一定的办学经费。在中国国内则设立理事会,执行董事部的决定。由董事部聘请的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日常事务。这就构成了董事会、理事会、校长及其行政会(又叫内阁)的办学体制。³⁰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保障了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高效有序性。

该校最初的大学学制为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预科第一班第一学年开的课程有“英文、化学、代数、西洋史、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宗教知识、体育,每周共计23学时”³¹。华西协和大学规模不大,每年录取学生十余人至数十人。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实行学分制,严格考试,加强学籍管理,强调竞争淘汰,以保证教学质量。1915年首届毕业生仅两名,分获学士学位。³²之后,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如1916年,在校生是75人,1920年,在校生是116人。从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从事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不少人还成为医学界或教育界等的精英分子,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对学生的生活管理亦有章可循,“仿牛津大学体制,实行学舍制。即按参加大学组织的差会划分区域,每个区域各自构成一个学舍。学生除在大学注册外,还得在所住的学舍注册,并接受该差会所派的舍长和舍监的管理”³³。即类似于现在的公寓制,减轻大学的行政负担。而大学则能集中精力管理各专业学科,实施教学计划,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

再以基督教美国美以美会在重庆创办的求精中学为例,对学生的管理可谓严格且细致,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有学者出入不得自由,如有要事出堂,必须禀明学主及各教员允准方可,亦不得在外住宿……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从学诸生应当随时以礼，不得于授课时借端问难以至侮慢达者。授课之时，诸生须闻铃而至，不得在外久延。诸生于每日之休息时内，咏诗、打球，固所应耳然，不得借此喧嚷。住堂诸生必须先去烟酒尤为深禁。³⁴

2. 课程设置逐渐淡化宗教性而突出儒学及应用性学科的特点

基督教教会学校主要开设的课程一般有英语、自然科学、语文、算术和音乐、美术、体育、宗教等，而且注重教学质量和校风校纪。教会学校尤其在开办初期，都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有些教会学校规定的宗教科目竟占每日课时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了宗教科目外，还必须参加学校规定的早礼拜，晚礼拜，星期的大礼拜；此外传教士还要学生参加兴奋会，查经班，祈祷会圣乐班和其它种种宗教团契”。³⁵这是因为基督教创办教会学校其目的仍是传播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育如同其他基督教事业一样，其根本目的在于表现基督教精神。表现基督教精神是传布福音最有效的方法”。³⁶以华西协和大学为例，在1910年大学章程中，就公开宣称：“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而美籍校长毕启也谈到，“我们大学的目的，……是要用基督教教育，感化四川省的人民”。³⁷加拿大籍教授客士伦曾为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大学的宗旨是要发展为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府，是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这些科学都将在这个大学里面被基督教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这高尚的理想的灌输，这就是创立者的宗旨”。³⁸藉此办学宗旨，基督教化得以全面的贯彻实施：《圣经》为“修身”必修课，礼拜为强制遵循的礼仪；灵修会、查经班、青年会等也融会于校园生活之中，强烈的基督化氛围，华西校地亦有“教会堡垒”的称号。

但事实证明，长期受到儒学熏陶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儒学的影响。一两千年以来，中国大众接受的是一种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其三纲五常、上孝下悌等伦理观念与民主、自由、开化的资本主义新文化格格不入，西方传教士梦想以耶稣来取代孔子，以便在思想文化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并非那么容易可以达到。因此，传教士们只好改变策略，对儒家思想作一些妥协，并加以利用。19世纪后期，一些传教士提倡淡化教会办学的宗教性，增强世俗性，提高儒学课程地位，大力推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

教会学校这样一种办学策略的转变在四川尤为明显。晚清时期的四川僻处内地，风气落后，而封建文化却十分发达。于是在川办学的传教士利用四川民情，延聘旧式文人讲学，使中国传统文化以渗透和试探的方式进入华西协合大学。比如，国文成为必修科之一，从1915年之后，来校任教的国文教员，多有前清举人、进士、翰林的头衔：如1915年为廖平（清进士），被誉为“经学大师”，1919—1923年为刘豫波（清拔贡），被誉为成都的“五老七贤”，1924年为文龙（清翰林），1925年为林思进（清内阁中书），1926年为龚道耕（清举人），被弟子奉为“纯儒”。

除了提高儒学课程的地位外，西方传教士还逐渐认识到，虽然西方的科

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为中国人所了解，但它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应该让教会学校的学生最先获得西方的优秀科学知识和教育，通过他们把知识传播给中国的民众。187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说：“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³⁹1896年，狄考文又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⁴⁰

教会这一提倡科学增强应用性的教育观念在实际的教学中得到了实践。在四川，基督教教会学校重视传授自然科学，在教授这些课程时，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雅安明德中学有这样的记载，化学老师上课时，总要搬来些仪器做实验，氢气、氧气、酸性、碱性都要叫同学们做一做看。上生物课时，常带同学到学校周外的山区去采集植物标本。有一次上生理卫生课还带同学到荒冢坝去寻找骷髅，讲解骨骼解剖。⁴¹

天主教在川的世俗教育起步较晚，不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明显落后于基督教的办教事业。但在20世纪初年之后天主教逐渐改变了办学方针，开始重视教学内容的时代化，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求。1913年川东教区创办启明学校，张贴的招生广告称“川东主教欲培育此种人才，不惜牺牲巨金，在曾家岩建设华丽学堂，特聘富有学识之中文教员……又圣母会之修士教以各种西学圣教道理兼法文字。学问之益，一言难尽，开人茅塞，辟人心志，增智识，加才干，使人之宗向愈高而愈贵，理想愈广而愈明……且学问使人理想合益，论事咸当，或写或说，应对万事，无不井井有条……加以通晓外国语言，并知各国政治、各种西学，则不特令人器重，而且令人惊奇，是皆由学问而来也”。该校的课程设置较之以往天主教的学校过多注重宗教思想的传播有了很大改进，比如小学部开设有中文、中国历史、算学、地理、绘画、歌唱、圣教道理等；中学部则开设了中文、中国历史、形性学、生理学、化学、数学、代数、量学、天文、绘画、体操、歌唱、哲学、圣教道理等。⁴²从课程设置上看，内容比较全面，有很大的实用性。

尽管传教士把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作为谋取基督教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教会学校毕竟开启了一扇让不离乡土的中国士人、学生甚至是民众了解和学习的窗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学校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腐败的政府无心、无力兴办教育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无疑起了较大作用。同样，教会中学传授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代替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进程，并极大地

增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中国的私塾或官学不同，教会中学设置了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学生日后谋生所需的纺织、园艺、烹调等职业性课程，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在教学中运用观察、实验教学等方法，并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如鼓励学生提问、讨论，让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管理等，这些都促成了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有效转型。

3. 重视体育课

在川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中普遍比较重视体育课。比较突出的如，1894年由英国基督教公谊会传教士在重庆创办的广益中学，体育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尤其是足球在校内广为普及。1900年该校开辟了西南地区第一个足球场，组织了西南第一支足球队，经常参加校内外足球比赛，是重庆中学界的冠军队。教会学校把体育课纳入到正式的课程设置中，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学校体育理论，带来了西方的学校体育制度。它们开展的体育教学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近代学校体育制度在旧时的四川乃至中国的建立。教会学校在学生中还设有各种运动队，举办各种竞赛活动，而这些都为中国近代的学校体育制度和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竞赛制度的建设带来了借鉴。同时，随着体育活动的开展，也使在校学生树立了西方的体育观念，竞争意识被引入，学生再也不崇尚“文弱书生”的形象，而越来越重视锻炼身体。

4. 受教育者的范围得以扩大

在教会学校开办初期，通常都是通过提供免费教育的办法召集一批孩童，教他们一些知识，同时自然要向他们讲经说道，慢慢的他们就会成为教徒，甚至传道人。如四川梓潼县有英籍女传教士易德礼传教的记载，有几个青年学生，为了向易德礼学习英语，隧与之交往，易乘机将这几个学生发展为教徒，并受了洗礼。⁴³对于在校学生，教会也通常给予一定的优待，如四川雅安明德中学，在校学生不收医药费，有病就到教会办的仁德医院去治疗。教会在办学之初，并不完全为民众所接受，因此学校为了吸引中国青少年入学，条件非常宽松，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和学习用品，个别学校还发放津贴给学生以补贴家用。

而教会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发展逐渐加快，这并非偶然，与此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社会呈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为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首先，资本主义化的新式机关、企业大量涌现，对人才的选择提出了新的标准，通晓英语，略知自然科学的毕业生为其首选对象。于是，注重传授西学的教会中学，因其毕业生得入报酬丰厚的外国洋行或新式机关而身价倍增。其次，由于社会风气转变，士大夫和官宦富商一反以往对西方文化的敌视与冷漠态度，从切身利益出发，纷纷把西人所办之教会学校视作儿辈理想的求学场所。这一变化引起了教会学校办学方

针的改变。此后，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对西学的追求，学生来源也于早期免费招收贫穷教徒子弟向以昂贵学费收录非教徒富家子弟趋进。因此可以说教会教育也扩大了在中国受教育者的范围。中国的封建教育，受教育者仅限于富家子弟和有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广大的贫苦百姓和妇女被斥于教育之外。而教会学校的开办使一些贫寒子弟得到了宝贵的就学机会。

5. 促进女子教育发展

中国的古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旧时女子要想读书认字，只能是从自己兄弟的私塾教师那里学一点，或者是从父母兄弟那里获得一点点教育。一个女子一旦结婚就成为夫家的成员，从此职责就是当好女管家和母亲，更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教育。而科举制的建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这也仅就男子而言，因此，政府举办女子教育似乎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女子只能在家庭受教育，勿庸特设学校，若正式设立女学，按张之洞的意见“恐染西方的习气，有伤风化”。⁴⁴而基督教历来重视女子教育，传教士林乐知在《重视教育说》一文中指出，“中国女学不讲，已废弃人民之半数”；“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兴女学”；“女子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国者也”。⁴⁵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一文中，针对有人提出的中国男子教育尚不能普及，何况于女子教育的说法，他指出：“男女等人耳，何分缓急，夫欧美女子，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有入红十字会者，皆亲历枪林炮雨之间，而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职，虽不与当兵之役，而已过半矣。其程工何亚于男子？”他断言：“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也”。⁴⁶

可以说，兴办女子学堂是西方，1884年美国美以美会女传教士柯立亚在重庆戴家巷开办一所女子小学，这是四川最早的女校，开全川女子教育之先河，也是成都私立华美女子中学的前身。1912年，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来到达县，开办小学，学校最初名为福音女子小学，开办工艺班，招收十五六岁信徒女子十余人学习针线和文化知识。1914年后开始招收小学生。学生除学一些启蒙的古文教材外，还开设圣经课。大班学生每月下午做两小时针线活，如做抽花枕头，手帕，打毛线，勾花边等，由英国人执教。1896年基督教英美会女布道会传教士在成都开办华英女校，1914年创办旧制中学。华英女中的学生来源，除最初采用办慈善事业的方式，吸收一些孤儿和贫苦家庭子女外，后来主要由英美会女布道会在省内各地办的女子小学和初级中学保送。创办初期实际是融学校、医院福音堂为一体，学校只不过是教会的附属机构，一直由教会直接管理。华西教育会成立后，即由该会统一领导。早期学校教学质量较低，课程有时也不开齐，如高中不设物理、化学，只讲一点“理科

入门”；英语规定为“随意科”，有的班级根本不学英语，以农业课代之。⁴⁷

虽然在早期女子学校教学质量并不算高，只学一点理科入门和英语等，但比起旧时妇女没有权利和机会接受教育来说，仍可称得上是一大进步。按照华西教育会的要求，华英女中家事课开设较早，并且“附设一实验模范小家庭，为女生试验家政之所。”家事课有课堂教学和实习。课堂教学主要讲授家庭布置、家庭财务计划管理、仪容服饰、烹调、育儿等知识。实习则在“家政房”，有两个学生组成一个“家庭”或4个人一个小组，由学校拨给一定数量的生活费，在那里学习煮饭、炒菜，带一个娃娃，给娃娃洗澡，梳头等。实习结束时，要办一桌酒席，请老师品尝打分。实习时间开始时安排一两个月，以后有所缩短。⁴⁸从华英女中教学内容上可以看出，均是与社会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物理、化学、外语、家事课等能使旧时女子初步获得谋生，治家的本领，与没有机会入学接受教育相比，也算是一大进步了。

教会女校开办之初，阻力重重。富庶之家，多不屑将子女送入此类学校。教会高校的学生多来自教民之家和贫苦之家。“学生入学的既不多，而中途退学的还不少，女校尤其如此”。随着教会女校日增，中国人的教育观开始发生变化。“兴女学”作为一种革新思想被国人大力提倡。最早倡导女学的是宋恕。他在1891年所著《变通篇》中提出：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早期维新家郑观应在其撰写的《女教》中，赞扬“泰西女学与男子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并建议中国政府应仿效西方“广筹经费，增设女塾”，“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⁴⁹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倡男女受教平等。他认为女子一切与男子无异，在教育方面不要分男女，应同等对待。他主张“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如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之例”。⁵⁰梁启超更是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女学的兴衰是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

“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由此他分析中国积贫积弱之因“必自妇女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女学始”。⁵¹

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月，清学部颁布了《女子教育章程》，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这是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中占有地位的开始，也是中国女子公开正式接受新教育最可纪念的日子。不可否认教会学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四川为例，随着对女子教育的日益重视，四川当地一些开明士绅亦先后开办女子学堂。如1903年留日归来张澜先生创办“南充高等小学堂”，后易名“南充女子师范学堂”，讲授地理、数学、图画、经学等。1906年成都府华阳县举人陈慎言，在成都南门文庙街创办“四川淑行女学堂”，“招收能识字、书写女子，分别讲授初、高等小学堂课程，颇著成效”。⁵²据重庆海关统计，1910年全省男生学校共计11224所，学生338078名；女生学校163所，学生5660名。⁵³1916年有男生高级、法律、师

范、中小学等共计14640所，学生500661人；女生师范、中小学共计495所，学生24624人。⁵⁴仅六年间，女校数量增加3倍，女学生人数增加4.3倍。

可以说，教会女学的兴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于妇女地位的尊重，开始打破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女学的兴盛也直接影响并改变了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在长期以来束缚中国妇女的思想樊笼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教会女校的反缠足运动。早在1875年，基督教伦敦传教会即在厦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劝禁缠足团体——“天足会”，编辑、印刷、各种刊物和小册子，举行演讲游说等大力宣传和推进不缠足运动。至1906年已在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建立四个中心，并在很多地方建立分会。自天足会成立后，教会女学中的不缠足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定规，教会学校不收缠足的女孩。”⁵⁵并且不缠足运动从教会学校中逐渐向家庭和社会渗透，使许多中国妇女逃过了缠足的厄运，为摒弃这一千年恶俗，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在1905——1906年，“成都、保宁府、嘉定府、夔州府、绥定府分发天足会书计1800册。于本城(重庆)所卖者1031册，又送成都某师母处3450册，潼州府某西小姐处8871册，万县某牧师处2313册。”在成都的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曾派“中国的教中妇女分发劝禁缠足的小册子，以及不缠足的鞋子式样，并向上百万妇女传播福音。”⁵⁶万县的泰勒夫人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宣传品的影响：“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衢，俾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⁵⁷

第 4 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医疗事业

4.1 天主教在川主要医疗事业

天主教会在四川创办的医院主要有，成都博爱圣修医院（1903 年），成都外北张家巷平安医院（1906 年），重庆仁爱堂医院（1900 年）。

成都博爱圣修医院

由法国天主教会修建，“由法教士担任院长，聘法医师 2 人，英美医师各 1 人，有床位 50 张，数年后渐增加到 200 张，分特等、甲等、普通三等，所有护士皆为华人，多系教徒。当日每日门诊约百余人”⁵⁸。

重庆仁爱堂医院

由法籍主教创建，方济各女修会管理。“医院占地 8179 平方米，砖木结构，一楼一底，呈“工”字形。其厢房前后有宽敞通道，屋前有小花园及亭阁。初期仅设门诊部，由法国人阿特里昂任院长，由教区聘请特约医生 1~2 人门诊治病”⁵⁹。

4.2 基督教在川主要医疗事业

基督教各差会于 1919 年以前在四川创办的医院有二十多处，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重庆宽仁医院

1891 年，美国美以美会医生马嘉礼，同一英国传教士来到重庆，在临江门（今市中区戴家巷）选址筹建医院。1892 年 10 月，第一座医院大楼落成，设门诊部、住院部，有普通病房一间，私人（高等）病房两间，病床 30 张，命名为重庆综合医院，中文称宽仁医院，这是四川省第一所西医院。1902 年 3 月，在美国妇女国外传教协会的赞助下，美国美以美会女布道会的甘伯尔夫人在渝中区石板坡修建宽仁女医院，专治一般妇产科疾病，儿童疾病。该医院可称为重庆妇产科医院之雏形。1903 年 7 月，又开设男医院，主治男性内、

外科。医院成立时即设立了内科、外科和牙科。1896年，重庆宽仁医院收治首例产科患者，采用新法接生。20 世纪初，开设有五官科，门诊治疗眼科疾病。医院开设之初，没有专职的护理人员，主要由修女担任护理工作，也有少数外籍护士⁶⁰。

成都仁济医院

1892年由中华基督教会加拿大医生创建于成都四圣祠北街。后来医院得到地方政府补助规模逐渐扩大。1907年四层医院大楼落成，设病床120张，医疗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的成都乃至四川都堪称一流。⁶¹

自流井仁济医院

1914年到自流井地区开展医疗工作的加拿大英美会在地方人士捐助下修建医院，1917年建成，称福音医院。这是自贡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医院。⁶²1919年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

阆中仁济医院

1895年由英国内地会创办。当时设有病床十余张，简陋的手术室和药房，开展外科小手术和接生。1897年增设病床40张，有医生，护士，职员，工人计30余人。在该院任职的八位院长皆为英国人。医务人员多为英国大学医学院或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具有内、外、妇三科技术力量。⁶³

宜宾仁德医院

由仁德男医院和明德女医院合并而成。明德女医院于1917年由浸礼会女传教士创办，收治妇产科病人，在宜宾首开新法接生。⁶⁴

4.3 四川地区教会医疗事业特点分析

1. 医疗事业作为传教的手段

从宗教本身而言，很多流布甚广的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治病救人，这是众多宗教传教的通用方式。在《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关于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这也正是以后基督教徒利用医药传教的教义依据。然而自康熙以来的禁教政策使传教活动遭到很大的阻碍，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来入侵者的仇视心理构成了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的强烈排斥，这使传教士的布道工作处处碰壁。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缺医少药的中国，施药和行医能够减少文化上的冲突与隔阂，消除国人对他们的抵制心态，也较少受到地方当局和当地绅士的干扰和阻挠。因此传教士们开始把医药传教作为他们福音传播事业的重要手段。通过免费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并在讲经布道的同时，广开诊所和医院。1835年

12 月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呼吁英美派医生来华传教，称“请医务界的善士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为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⁶⁵

在四川教会医院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较早来川的天主教传教士巡察各地时，往往装扮成江湖郎中，把宗教用品藏在药包中，躲避官府的检查，方便行动。他们每到一处就摆起地摊，铺开药品，将宗教物品夹杂其中，作为标志，联系教徒，利用看病施药机会，开展宗教活动。1860年之后，传教活动从隐蔽到公开，天主教会在建教堂的同时，也开办诊所或施药处，挂上“奉送医药，不取分文”等招牌，借医药为媒介，接触群众，发展教徒。如简阳等地，“天主教来自同治初，施济医药，曰复醒堂。光绪改元，渐次传教，本堂主教曰司铎”。⁶⁶

1891年基督教各差会在四川尚未建立学校，就开设了3所医院及7间诊所。⁶⁷1887年曾在四川活动的美国传教士高尔德公开宣称：“医学传教士的目的，既不是介绍医学，也不是为慈善而慈善，他们无非是用治病为传教手段。”他们每建立一个医院，便在医院大修“礼拜堂”，设“宗教部”“报恩堂”。早晚规定作祷告，星期日参加礼拜。门诊部每天有布道员向候诊的病人讲解“福音”，散发“劝世文”，甚至连复诊券上也印满了“圣经”。唱诗班经常到病房唱诗布道。⁶⁸雅安仁德医院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于1907年成立的，对于医院中的宗教活动有这样的记载，每天早晨八时，有早礼拜，邀请能走的住院病人参加，医院医护人员也必须参加，由布道员或教会牧师讲道，唱赞美诗，作祷告。在病室中，布道员到病床旁向病人讲道，为重病人祈祷，求神的帮助。也散发宗教传单或圣经中故事画图。……每年三月复活节之前也要向医护人员劝说，在复活节一天去教会收浸礼入教。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医院要开庆祝礼拜，讲耶稣降生故事。⁶⁹

2. 不平等条约为教会医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不得不给传教士诸多特权，医学传教从此处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他们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传教，而且医学传教也获得了条约保护。《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地”。《中法黄埔条约》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同急院、学房、坟地各项”。⁷⁰条约的规定为设立医院提供了依据，实际上是为医学传教提供了法律保护。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医学传教赋予了新的权利。由于新开了许多口岸，传教士可以进入这些新口岸。而且《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规定。⁷¹1860 年各国与华签定的北京条约承认了天津条约有效，并获得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此后不少国家纷纷效尤，获取了此项特权。这就为教会医疗事业初步发展提供了

特殊的有利条件。

在四川教会医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重庆海关统计，1891年全川有教会医院3所，药房6所，而十年之后就发展至医院19所，药房192所，其中属于天主教的医院有10所，药房180所。在川传教的天主教，在咸丰初年，即在川东教区重庆购地建房，成立供养老年神父、工友及少数鳏寡教徒的爱德堂，⁷²后又在重庆马王庙、江北、成都等地设立诊所。1900年在重庆建立仁爱堂医院，1903年在成都建博爱圣修医院，1906年建成都外北张家巷平安医院。在川传教的基督教，从入川开始就筹集款项，置地建房，配置人手，筹建医院或诊所，1891年即开设3所医院和7间诊所；1901年，医院发展到9处，诊所12间；1913年，医院13处，诊所20间，有外国医生39人，是年住院病人3789人，门诊病人58045人。⁷³在川的基督教会创办了四川省第一所西医院——重庆宽仁医院，自贡第一所西医院——自流井仁济医院等等。

3. 教会医院客观上促进了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四川虽没有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入侵，但外国的侵略势力仍通过间接途径不断冲击四川社会经济，人民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鸦片泛滥不仅使社会经济畸形发展，且使四川群众的身体和精神遭到极大摧残。再加上地方官吏恣意横行，鱼肉百姓，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艰辛，几乎被逼入绝境。1852年四川许多州县发生灾害，“饥民食蓬草，草尽食白泥”，“民挖蕨根充饥，几不聊生”。广大民众在生活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如遇疾病瘟疫，则只能听之任之，何来条件求医问药。邛崃在清末明初时，瘟疫流行，死人无数，是旧时四川的一个缩影：“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冉义乡暴发霍乱，死数百人；同年秋，桑园乡霍乱流行，也死数百人。清宣统三年春，下坝乡暴发‘流感’，全乡百分之八十的人患病。仅徐营约五十户共二百多人中就死了二十人；秋，该乡疟疾流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患病”。⁷⁴在这样艰难的社会环境之下，也常有布道的传教士在瘟疫中丧生的事情发生。

教会医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人民提供了相对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免除了老百姓的病痛，增进了人民健康。部分传教医生放弃了相对优越的城市生活和优厚的待遇，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缺医少药自然环境恶劣的偏远农村治病救人。在传染病流行时，各教会医院为群众免费预防注射。1897年阆中瘟疫流行，仁济医院又施医施药，去医院救治者增多。三台仁慈医院除了规定看病不收费外，还用挂一次号有效期半年等办法优待病人。绵竹仁泽医院还派专人随访病人。雅安仁德医院每年都要在院内进行种牛痘，并派有经验的医护人员去附近各县种痘。不能付费的也酌情减免，极受群众欢迎。按季节也进行伤寒霍乱疫苗预防注射。传教士及教会医院的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群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改善了当地的卫生状况，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早期医学传教固然有许多缺陷，但是一系列诊所、医院的设立却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医学，使他们接触到西方医学科学。例如，1877年英国内地会牧师麦卡梯在巴县城（近重庆市中区）设立诊所，在四川开创了使用西医技术和西药的历史；四川省第一所西医院——重庆宽仁医院，是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成都仁济医院由中华基督教会加拿大医生创建，其医疗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的成都乃至四川都堪称一流。自贡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医院——自流井仁济医院是由加拿大英美会建立；

“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林则 1907 年被加拿大英美会派到四川工作，成为第一个来中国的牙医传教士。1907 年在成都首创牙科诊所，开初并不为人所重视，但林则手到病除的精湛技艺，很快就名声大噪，求医者日益增多。1911 年诊所扩建为牙症医院，成为西南地区首家正式的牙症专门医院。后来又新建口腔医院，分有五大部门，号称“远东第一”。当时的四川缺少牙科医生，有十万人的成都，唯林则一个牙医，身兼医师、教师、助手、护士、技师诸职。为了培养中国的牙科医生，而使之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学徒，林则又与华西协和大学联手，在大学开展牙科教育，培养牙医人才。1917 年在华大建立牙科系，这是中国最早的牙科专业，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此后全国口腔学科的人才多是从这里毕业的。不仅是为四川，乃至全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医学技术并且将医学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促进了西方医学的传播和发展。

4. 教会医院改善了妇女就医条件

传统的中国社会，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困扰妇女生活，而妇女的医疗问题更加不被重视。来华的传教医生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民众都知道“外国医院对于看护孕妇与助产工作甚为擅长”。⁷⁵就四川地区而言，1902年3月，在美国妇女国外传教协会的赞助下，美国美以美会女布道会的甘伯尔夫人在渝中区石板坡修建宽仁女医院，专治一般妇产科疾病，儿童疾病。该医院可称为重庆妇产科医院之雏形。1896年，重庆宽仁医院收治首例产科患者，采用新法接生。宜宾明德女医院于1917年由浸礼会女传教士创办，收治妇产科病人，在宜宾首开新法接生。1895年成都教案暴发期间，还发生一位妇女早产，传教医生从打教者那里买来一瓶他从教会医院抢来的石炭酸（消毒用），用来救治这位妇女的事情。⁷⁶这些都为改善四川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及生存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5. 教会医院的两面性

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

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励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从而获得慰藉。”⁷⁷

但是教会医院其与生俱来的帝国主义本性仍不容被掩盖，在关于雅安仁德医院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孤儿因脚疮入院，入院前还能行步，入院后反而不能移动，直至溃烂生，已到九死一生之际，医生对他仍视而不见。他不得已带着重症出院，几乎成为残废。还有更惨无人道的要算任意堕胎作为试验标本。每遇孕妇来院诊病，即用谎言欺骗，或说病情复杂，如不将胎取出，大人就有生命危险。以此法取得从结胎时到十个月止的无数胎儿作为标本。⁷⁸

第 5 章 近代四川地区教案

5.1 近代天主教在川主要教案

第一次重庆教案

第一次重庆教案（1858年）由“还堂”事件所引起。教会欲将崇因寺拆除，改建天主堂。不料此事引起民众怨愤而捣毁了驽家桥的真元堂等教会建筑物。此事件被称为第一次重庆教案。后调停议妥：“八省会馆赔款二十余万两；允法国教士‘另行卜地建修教堂’，‘各属境内教民如有典买田宅修理经堂、医馆等项，该处士民均宜玉成其事’”。⁷⁹第一次重庆教案使得川东主教在川东“属地”有了广修教堂的权力。

第一次酉阳教案

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酉阳州小摇坝修建“公信堂”，公开招收教徒，并设置“教党”武装，修筑寨堡炮台，引起当地士绅等地方势力不满。团首张佩超、冯仕银暗中支持民众反教。1865年3月4日，刘胜超带头聚众捣毁“公信堂”，反教风波迅速波及州境。9月底，土家族头人冉从之将法国传教士殴毙于州城隍庙内。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兵入川，施加压力。清廷被迫将候补知府董貽清、试用知州邓清涛撤职，命川东道尹锡佩接办此案。1867年12月6日，中法双方议结教案：冉从之处斩；刘胜超、张佩超父子等杖责发边远充军；赔偿教会银8万两。⁸⁰

第二次酉阳教案

第一次酉阳教案的处理结果，激起地方士绅、团首极大不满。地方名士宋昭楼、冯石渔等与酉阳各团首暗中结交，伺机再次打教。适逢教民龙秀之勒逼退婚，引起民教纠纷，成为第二次酉阳教案契机。1868年12月15日，团首何彩聚众焚毁酉阳州火石垭教堂，继而捣毁州城教堂，法国传教士李司铎被烧死。打教风波波及全州及毗邻的贵州遵义等地。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员来川，以动用武力相威胁。清廷将酉阳知州曾传道革职调任，翌年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入川查办。1870年1月6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代表在重庆议结此案：何彩押赴重庆斩决；赔偿教会银3万两。

第一次大足教案

第一次大足教案（1886~1887年）因法教士平时为非作歹，又与百姓发生口角而起，此次教案与第二次重庆教案一并议结，“大足赔银一万五千两，并通缉主犯”。⁸²第二次大足教案（1890年）以余栋臣为首的民众捣毁教堂，杀死教民，拆毁教民房屋。1892年议结此案：赔偿教会银5万两；通缉余栋臣等人。⁸³

第三次大足教案

第三次大足教案（1898年）由当局诱捕余栋臣，群众劫狱，捕捉法籍教士华芳济而起，义军还发布檄文“……今洋人……侮谩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地都，奸淫我妇女，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菜果，国债重于邱山……惟本义民今日之举，以剪国耻，以彰盛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⁸⁴并张贴标语“顺清灭洋”、“除教安民”等。后“人心感动，附从者众”，四川30余县及湘、鄂、云、贵等地亦纷起教案。1899年清廷迫于法帝国主义压力，大举进剿，余栋臣被捕，禁锢终身。最后赔银118.61万两，⁸⁵以四川昭信股票抵押，相当于川省当年财政收入的10%。此教案是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案，影响深远，到辛亥革命前后，当年的义军又投入四川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黔江教案

1873年1月，天主教川东教区主教范若瑟决定在黔江地区建立传教点。2月21日，范若瑟要求川督与川东道札示黔江知县办理。8月26日，法国神父余克林、中国神父戴明卿来到黔江，在城内强行购地，逼劝百姓信教。9月2日城内出现揭帖《大法国使臣告示》，内中多侮辱性言辞，地方士绅皆忿忿不平。贡生李渊树、文生杨万象等暗中支持民众打教。9月4日，城内贴出打教牌告。5日，各街鸣锣集众打教，余克林、戴明卿在县衙门口被围殴致死，陈正伦在城外被殴伤，教堂房屋全被捣毁。

教案发生后，法国驻京参赞洛克特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立即查办。总理衙门勒令川督速结此案。川督札委重庆四望关盐捕府等在重庆会审此案。由于法国公使和教会刁难，索赔甚巨，且不让原告出席，地方官员亦不卖力查办，致使该案拖延近两年未结。1875年6月2日，中法双方在重庆议结条约：黔江县令革职；凶犯充军、处斩；赔偿教会损失及教士命价银4万两。⁸⁶

5.2 近代基督教在川主要教案

第二次重庆教案

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年）导火线是美英传教士在地势险要之地浮图关鹅项岭置地建房，招致绅民反对。他们拆毁英美教会所建房屋，捣毁天主堂、修道院及医院等。重庆地方官府虽尽力保护外国教会，但众怒难犯，重庆反洋教斗争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等地。此次打教参加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超过第一次重庆教案。结案赔款，其中“美国教会2.3万两，英国教会1.857万两，法国教会22万两”。⁸⁷

成都教案

成都教案（1895年）端午节，部分群众与美道会教士发生冲突。当天即捣毁四圣祠北街福音堂及诊所，深夜又将天主堂，育婴堂和法教士住宅一并捣毁。第二天又到玉沙街，正通顺街，陕西街，先后捣毁基督教女传教士住房，内地会福音堂，美以美会的教堂和诊所。很快成都附近许多州县人民相应，纷纷捣毁当地教堂。“计属于美，英基督教会的有三十处，属于天主教的有四十处”。⁸⁸此次打教事件，传教士并未受到多大伤害，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在六月四日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说：“除了天主教的主教外，没有外人受伤害，就是该主教的伤也很轻微”。⁸⁹但法英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扩大事端，并不满足于地方政府承诺的赔偿和逞凶。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到“单是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匪棍，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发生恐吓的效果”。⁹⁰于是，英、法、美各国派出八艘军舰游戈长江，向清政府进行恫吓、威胁。田贝还无耻地要挟清廷，要严办当时四川总督刘秉璋。清政府完全屈服了，赔银一百多万两，“民众处分十七人，死刑六人，知县等官处分十一人”。⁹¹此次教案是四川历次教案中，赔款数额最多的一次，超过百万，也是首开重惩大吏的先例，上至总督，下至十余名道、府、州、县的官员，都被革职，撤任，永不录用。

重庆江北教案

1898年，重庆美以美会传教士到江北开辟活动点，借当地人名义租房。在整修房屋期间，当地民众得知是外国传教士开“医馆”传教，便怒不可遏，围住医馆，发生斗殴。结案，逞凶，赔款白银5400两，老百姓“乐助公德”银1000两。⁹²

玉龙镇教案

1899年英国公谊会传教士到盐亭县玉龙镇传教。由于是第一位到此地的传教士，在出售圣经小册子时，被当地人围攻殴打，后仓皇出逃。结案，除逞凶赔款外，还允许在玉龙镇设教堂。

5.3 近代四川地区教案特点分析

四川虽交通闭塞，深居内陆，但其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所以自明清以来即是天主教、基督教之传教重地。在《中国一瞥》(Spend ten Minute in China)中，曾这样写到：华西（这里包括甘肃、西藏、贵州、云南、四川）是“亚洲的角逐场所”，四川“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富饶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控制了四川，便控制了全中国”。成都的特别重要性还在于它的位置，“对千百万藏民、回民以及其他土著部族的位置影响”。⁹³因此，在四川发生的民众反抗天主教、基督教势力的教案也颇受人关注。在 19 世纪后 30 年中，全国发生的重大教案 25 起，四川就占有 7 起。⁹⁴而天主教由于入川时间较早，分布范围较广，再加上自身具有的封建性、封闭性等特点，与教民的冲突又远远多于基督教。在川历史上的几起重大教案中只有第二次重庆教案和成都教案是因基督教而起，且也波及天主教。纵观四川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发生教案的时间大都集中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几起重大教案也大约在这一时间段，而 20 世纪初年，即义和团运动之后，教案数量减少，并趋于消亡。下面以近代四川地区发生的几起重大教案为例，分析其特点。

1、因教士还堂、置产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给还旧址的条文，深入内地，有恃无恐，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迫令归还教堂旧址，索要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有些传教士还强买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产。每当教案发生，传教士往往不论是非曲直，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决，对涉案的非教民还经常滥行诬指，向地方官控告，或者请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如 1863 年四川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重庆教案，其起因就是由于法国天主教强占重庆长安寺，结案后实际上是为天主教在四川占地购屋开了绿灯。随后，按照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英美等基督教国家也陆续取得这一特权。据 1910 年四川洋务局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法、英、美、德国在川教会占有地产 17386 亩，占有房屋 864 所又 9 间，其中法国有房屋 629 所又 419 间，地产 16680 亩；英国 181 间，地产 700 亩；美国 47 间，地产 6 亩；德国 7 间。⁹⁵针对天主教的很多教案皆与土地有关，而天主教的传教士在霸田置地之后，就开始租佃土地，剥削教民及周边农民，这一切都源于法国天主教本身有着极强的封建性，随着其宗教势力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将封建小农经济的特性移植于他国。

2、士绅成为教案领导，官吏暗中支持

在反洋教群体中，除一般民众外，还包括一部分作为统治阶级的士绅。

士绅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传教士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中国，想用耶稣代替孔子，使中国皈依基督教；传教士借口“还堂”，往往“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日教堂，逼令民间退让”。⁹⁶他们霸占土地，招佃耕种，实际上夺走了乡绅一直赖以生存和发财的命根子：土地和剥削对象——佃户，严重侵害了乡绅的经济利益；又通过经常举办慈善事业与士绅争夺民心，所有这些都损害了士绅的权力，严重削弱了士绅在基层社会的权威。这自然激起了士绅的强烈不满，便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反教会“斗争的旗手和鼓手”。⁹⁷而士绅与民众的关系本身就较为复杂。一方面，士绅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剥削者、压迫者，民众有反剥削和压迫的愿望；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一般民众，又因士绅的身份、学识、名望等因素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存有敬畏之情，尤其是在外敌当前，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际，这种情感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士绅的号召力会更为增强。于是士绅们利用自己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广泛散布反教言论和匿名揭帖，积极鼓动或亲自带领民众反教。以四川大足为例，1865年，法国传教士骆某即窜到大足，“传集信众，捐资置业”，在马跑（今石马）之燕子窝修建大足县第一座天主教堂。1882年法国传教士范若瑟先后在龙水、三驱、万古修建天主教堂，并且以教堂为据点，强买附近田产，在龙西二村就占买水田1200亩，马跑教堂先后占买田地1500亩，⁹⁸然后即利用土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剥削。这些行为不言而喻都会触及地方乡绅的利益。因此大足教案即是由当地士绅余栋臣领导，并有一大批乡绅积极响应且解囊相助，仅大足、荣县、铜梁三县殷户，捐银助饷，有捐百两者，有捐二百两者，有捐至千两者。⁹⁹在两次酉阳教案中，领导者和支持者都是地方乡绅、名士，其原因是法国传教士进入当地设“教党”武装，修炮台等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行为已触及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率领民众打教。

就各级地方官来说，传教士的治外法权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使他们天主教基督教产生反感。但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认真履行条约，否则自身难保。因此，他们多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暗中支持士绅从事宣传和组织反教活动。以四川为例，1880年四川泸州白云场新开屠教案，知州田秀粟“尤嘱谕平民，以后凡遇教民，尽管殴打，有本州作主”。¹⁰⁰正如川南孟主教所言，教案“虽系平民怀疑启衅，半由地方官暗长刁风”。¹⁰¹1898年大足教案中，“大足县令甚恨洋人，任令余蛮子、蒋赞臣，带众持械，到场操练，并往攻教民滋事”。¹⁰²1863年酉阳乡绅冯仕银、张佩超、宋文选等率众袭击教民和神职人员后，“教民纷纷具控，董牧（贻清）概悬不办”，接任的邓清涛也“一味拖延”，并把冯、张、宋等绅“日召至署内朝夕相见，各叙寒暄”。而当不久冯等杀死前来处理前案的法国副鉴冯弼乐时，邓牧又“捏以入庙烧香之人与之口角，因用石块打毙等语”。故范若瑟气愤的说：“官府之办逾缓，而土豪之恶逾甚！”法国人罗亚叙也曾指出：杀害冯弼乐的凶手“刑章不加其身者，因其系该处巨富，地方大宪皆巧为开脱耳”。¹⁰³可见，在多数教案中，地方官暗中支持平民是不争的事实。

3. 迷信与谣言成为反教活动的催化剂

人们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与对教会势力的不满和愤怒联系起来，迷信和谣言对教案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讹言与教堂挖眼、剖心、诱奸妇女等谣言相呼应，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教会的仇恨。

比如1895年成都教案暴发前，在城内贴满了告示，内容大抵是：“兹告示如下，洋鬼子唆使坏人拐带小孩用以榨油，我家女仆亲眼目睹，大家不要让小孩出门，希望大家配合”。¹⁰⁴打教期间还发生，一个舌头被割掉的小乞丐被带进衙门，据说是传教士割了他的舌头，成罐的牛奶被倒在街道上，据说传教士把小孩的脑浆榨出来混在牛奶里。¹⁰⁵

4.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教义中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是伦理规范，强调“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所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儒家的这一宗法伦理思想是在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一方面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成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又适应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家族制度的需要，在广大被统治者中有深厚的基础。它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水乳交融，使它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坚韧性。而基督教被斥为“三纲五常全不要”，“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称，谓世上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谓尊卑者”。¹⁰⁶实际上基督教认为，人只要有信仰，在上帝面前便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信仰使得人人平等。基督教宣扬的是同胞之爱，是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幼，全以兄弟姊妹相称，应放弃相互间的一切隔阂。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们视西方宗教为洪水猛兽，唯恐其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不自觉地举起“卫道”的旗帜。1861年长江上游地区出现一张反教揭帖：奉洋教者“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且蛮性属火，最好奸淫，凡从教人所生子女，任其选择，不准嫁人。现今奉教者，鲜不受其侮辱，其子孙多半出于蛮种”。¹⁰⁷1898年，余栋臣的起义檄文中称：洋人传教“夺小民桑农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侮谩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地都”。¹⁰⁸川地民众的这些反应充分说明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敌意和抵触。

5. 小结

四川作为天主教基督教传教重地，反洋教斗争也颇为激烈，如大足教案、成都教案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反洋教斗争是由带有强烈扩张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侵入封闭专制的古老中国而引起的。其波及面和冲击力

远远超出了中国国界，一度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反洋教斗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人民逐步认清西方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也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为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使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反洋教运动中发现了蕴藏于中国人民之中的巨大生气，“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各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¹⁰⁹这种新认识是在反洋教斗争高峰——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些较明智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因此反洋教斗争也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迫使西方各国放弃“瓜分中国”转而“以华治华”的策略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6章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川传播差异及原因分析

6.1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

1. 基督教后来居上，发展迅猛

前面已经提到，天主教入川时间较早，明末清初即进入四川，在川活动时间长、范围广，虽然在乾隆嘉庆大规模禁教期间曾经历多次打击，但教会活动仍在延续发展。鸦片战争之后，法国的天主教势力复兴，但在这个时候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会也接踵入川，发展教育与医疗事业，扩张影响，与在川的法国天主教角逐。基督教虽入川时间晚于天主教，最初规模不能与天主教匹敌，但却后来居上、发展迅猛，尤其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年间，其在四川地区的势力和影响的扩张远远盖过了天主教。

2. 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更多由基督教传入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方式上更灵活，更易被四川当地民众接受，在兴办教育事业时更注重传播西方科学，在兴办医疗事业时更多的是带来西方先进的现代医学。四川地区的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牙科诊所均为基督教所办，第一所大学、第一所盲哑学校也是基督教所办。从数量上讲，基督教在川所办西医院和教会学校明显多于天主教所为。而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基督教的教会学校更多开设了物理、化学、几何等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的文化课程，而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在这方面的设置明显不如前者。事实上，由当年的教会学校沿革而来成为历史悠久、学术传承优良，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校中，基本都是由基督教所办的教会学校，比如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学，重庆的求精中学等。可以说，从打破四川地区的文化落后、封闭，推动近代四川社会进步、走向现代化的角度来讲，基督教在客观

上起到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天主教。

3. 天主教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与基督教传教相对应的是，法国天主教在川的传教活动却引出了更多的冲突和纠纷。前面在讲述基督宗教在川教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天主教一入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置地建房，霸占田产，剥削农民，而这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最后导致冲突激化直至爆发教案。在四川暴发的教案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天主教，只是偶然涉及基督教。总之，天主教在川的活动似乎负面的影响更加明显。

6.2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差异原因分析

6.2.1 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天主教与基督教之差异

从西方宗教发展史来看，基督教（西方所谓的“新教”）与天主教虽然同宗同源，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新教的出现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止一次指出，对资本主义来说，新教是最适合的宗教形式；而罗马天主教原是同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¹¹⁰新教产生于被恩格斯称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化和共和化的特点，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基督教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往往借助政治势力，联系社会上层，多在城市活动。尤其是新教教义有意打破了保守的天主教过分恪守宗教教义、回避世俗生活的传统，强调积极参与到世俗生活中，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对社会的奉献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

在四川的传教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常常从鼓吹个性解放的教义出发，着重对成人个别吸收，不搞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的教民村，也不设或少设育婴堂。而其活动有明显的商业性，也是和基督教提倡面向现实、发财致富的教义相联系。特别是基督教平等民主原则，易于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某种共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基督教进入四川的时间虽迟于天主教，但发展迅速，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非天主教可比。“英美新教徒的传教，差不多一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求最快地一直到这个省的最偏僻的角落，并在很大的范围内获得成功。即使不算新成员的倍增，至少是表示出他们资财丰富，人员出众，精神振奋，传教有力”。¹¹¹基督教虽派别复杂，但信仰简单、直接，活动自由灵活，组织性不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方式多采

取露天布道、散发福音书和其他宗教书籍，争取群众，改变观念。

我们在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教活动中就可以看到，曾在乐山活动过的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为了打破当地人对传教士的偏见，并能逐渐接受他们，常常自己掏钱印制福音书，并到乡下劝说当地人来领，他们说：“我们也想过卖这些小册子，但这样一来，一定会有人得不到这书，他们没钱买”。¹¹²曾在自贡活动的美道会在传教方式上采取流动布道，发展教徒成效显著。流动布道以流动布道组的形式活动，或以教堂为活动中心，或住在原有教徒家中，或住在栈房（小旅馆）以内。其中配备相当的长于声乐、器乐和从事医务事工的人员，随带留声机、唱片、手风琴和简单的药物、器械轮番赶集市、赶庙会。一般在教堂，或借用庙宇、祠堂、学校，有时晴天救灾露天空坝，以看病、施药、演奏音乐等办法吸引群众，集会宣讲。平时，三三两两“访寒问苦”以赠金钱、送画片、问病、送药和群众发生或加深联系，有目的、有对象、有步骤地进行个别串连。教士和女教徒并采取串门子的方式，深入妇女群众。通过这些活动来建立起经常和固定的联系。同时，不定期举行礼拜，参加的人，是指定教徒分头邀约所联系的群众，辗转串连而来的。礼拜的内容，是唱圣诗、做祈祷、读经，同时伴以音乐演奏、讲故事和专题演讲等等。由此他们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而广泛使这一时期成为发展民众入教的高潮。¹¹³

但天主教会却暴露出封建、保守的色彩。他们在四川实行教阶制度，层层控制，大搞不受中国政令管辖的教民村，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使教民对教会的封建性人身依附大为加重，而各修会之间的配合，更助长了部分教士和无赖教民的凶焰。天主教注重礼仪规范，等级森严，结构有序，有完整而严密的组织结构，其封闭性容易与民众产生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高阔厚垣，踞严城中，俨然一敌国，终日闭门，不与人通庆吊，毁之者辄被捶楚，人安得不疑其妄。且其机器之精，旨出人意料；红毛黑肤，谄般怪状，故其所毒，或言某邑镇山之宝，被其采取；或言其他所产物，被其置毒。一人倡之，众人和之，牢不可破。或有为之分辨者，众且斥为彼教之人，故相回护”。¹¹⁴

在华传播西学的工作大多是基督教传教士所做的，四川也不例外。重视人才的培养，所办学校较多，在华文化教育的重点也是传播近代科技知识的中高等教育。因为鼓吹理性思考的新教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对近代科学不仅更加容忍，反而甚至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事实上不少西方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新教徒，他们认为认识自然就是在领悟造物主的旨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传教士传入的那部分西学为19世纪中国国内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养分。康有为曾公开承认新教教会书刊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刺激和影响并加以引证申说；梁启超称，《佐治刍言》是“言政治最佳之书”，《泰西新史揽要》是“西史中最佳之书”。¹¹⁵基督教会还兴办女学和特殊教育，新教传教士的妻子倡导不缠足运动等，这些都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天主教多年来充当封建统治工具，侧重在农村活动，农民中天主教徒较多。天主教会也开办了很多学校，但大多数是小学水平，讲课用中文，课程和课本的宗旨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宗教信仰，很少或几乎没有做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或许是因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同天主教会的神学统治有过激烈的冲突，很多科学知识曾被天主教廷批判为洪水猛兽。

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更加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活动提供一种道德上的支持，正如韦伯在解读新教徒时说：“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¹¹⁶所以基督教在华经费来源主要是来自外国资本家捐助，经营各种企业的利润以及勒索的教案赔款等。在经费来源上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基督教在华也有侵犯中国主权、掠占地产的行为，但数量远远不及天主教，且罕见有用于租佃剥削的记载，占地主要用于建堂造屋，甲午战后还用来开设工厂，适应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十九世纪末，有人作过这样的对比：“购地掌业，……前会（在华天主教会）较后会（新教教会）为甚。教中神父，于择地建堂诸事，皆极精能，且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经营番息，……佃田赁屋，概凭大道生财。用是此会（天主教会）经费，半皆就地取材”，而新教则“全赖资遣者供养”。¹¹⁷

但由于天主教与现代商业活动的价值冲突，天主教在华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所掠夺的不动产收入、教案赔款等，还有得之于国外各方面的捐款以及来自高利贷利息和所经营企业的盈利。近代在华天主教的封建性的集中体现即是霸占田产，租佃剥削，并以之作为其活动的资金来源。近代中国的大地主除军阀官僚外，就是天主教会。以四川大足为例，余栋臣起义前，在大足龙水仅水田就占去1200亩。教会霸占了田产后，转而用来对教民和教堂周围的农民进行租佃剥削，与中国封建势力紧密结合。

从四川地区的教案冲突不难发现，基督教教案数目少，其中美国传教士所引起的应该是比例最小的。直到义和团事件为止，有关美国的教案，与其他各国相比，影响较轻微，牵涉较单纯。美国政府对其在华传教士的支持与“保护”，不如英国之积极，更远不如法国之妄肆。纯粹因美国教会而引起的暴行，在四川最重要的只有1886年的重庆教案一次。

6.2.2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分析：英美与法国对华外交策略的差异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极力借助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士进入中国铺平道路，

冠冕堂皇的声称是为了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但在十字架的背后却是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新教传统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还是天主教传统的帝国主义法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803年来到广州的美国教士艾利亚·裨治文曾经自称：“我等在中国宣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政治的目的在现实中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攫取。1840年，英国议员梅生说：“基督教传教士是商业的先锋。如果没有他们在前开路，提高异教徒的生活，南开夏的羊毛制品是不能像今天这样普及到世界许多角落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介尼甘地也认为：“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¹¹⁸这些露骨的自供完全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教会向中国进行侵略的野心。天主教传统的法国也不例外，拿破仑三世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拿破仑三世曾向罗马主教表白：“我希望能给中国传教事业增加新的生力。……这与一般宗教利益无关，而是为了使中国的传教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手掌，因为他们已着手这项事业了”。¹¹⁹下面我们可以分别从英美法三国当时对华的外交策略来理解这个问题：

英国是近代最早侵略中国的国家。自1840年以来，它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迫中国割让香港，开放数十处通商口岸，垄断中国的航运业，开设银行、洋行，逐渐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并向中国输出大批工业品，在中外贸易中占居垄断地位。到19世纪末期，美、德工业后来居上，超过英国，但在侵华列强中，英国所攫取的权益仍占绝对优势。

以四川为例，四川总督丁宝楨曾对英国侵略者的野心作了深刻的揭露“臣窃揣英人之意，从前专注意海疆，今则二十余年船炮即极坚利而沿海之地势人情亦经熟悉，自以为经营就绪，惟不通海疆之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数省未能水路相通，彼就目前视之，实觉毫无可恃，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而蜀又为数省中菁华聚集之所，故英人此时用意在蜀，蜀得而滇黔归其囊括矣。次实英人目前肺腑之谋也”。¹²⁰《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即派“驻寓官”到重庆。他们“遍历川省，特为访查各处土产，采风问俗，以使日后通商之举”。英国的商品可由轮船直运宜昌，再由帆船转运重庆。这时，四川逐渐成为英国在中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不仅如此，英殖民者还在川开设工厂、输出资本，利用当地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其高额利润为其它侵略分子垂涎。1891年至1911年的二十年间，各国先后在四川设立公司、洋行达五十余家。据重庆海关统计，1892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值为580多万海关两，1911年增至1900万海关两，二十年中增长三倍多。¹²¹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煤油、西药、纸张、香烟、染料乃至洋伞、洋灯、厨房用具、鸦片烟灯也充斥四川城乡市场。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不仅造成四川对外贸易严重入超，而且对四川的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起了显著的破坏作用，加速了四川自然经济的解体。

曾有这样的记载，四川巴县“乡镇间小工业，四十年前纺花手摇车家皆有之，每过农村，轧轧之声不绝于耳。棉纱的畅行，此事尽废”。¹²²四川嘉定(今乐山)“自洋市盛引，土布日贱，计共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¹²³

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忙于在美洲地区扩张领土，发展国内经济。1861—1865年间，美国南北双方相互厮杀，元气大伤。此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发展国内经济上，无暇东顾，只是“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¹²⁴此时的美国尚处于崛起时期，经济实力仍难以与英国抗衡，在对华政策上亦长期追随英国，保持低姿态，强调与其他列强协商合作。实际上美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早在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之时，美国就要求与英国享有同样的权利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得到最惠国待遇。1845年，美国国务卿布坎南就指出：“要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共同市场以保持中国的现状，促进美国对华通商”。¹²⁵1868年，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向国内建议同英国合作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对外开放。他认为：“假若这个国家向所有国家自由开放，美国的企业将会兴旺发达。”¹²⁶当1869年美国建成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时，一位企业家就兴奋地指出：这条铁路可以使美国东部的机械等产品30天内运抵中国，并换取中国的茶叶在30天后运回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美国政府在商业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美国对华出口1896年为700万美元，1897年为1200万美元。1899年上升到1400万美元。¹²⁷

美国为了攫取在华的商业利益，面对在华已有各自势力范围的列强，并不完全诉之以武力，而是使用更为隐密的手段。早在1843年美国政府任命顾盛作为代表来中国谈判条约时，给他的指示中强调：“去培植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绪，才是得计的”。¹²⁸正如驻华公使田贝所指：“传教士是贸易和通商的先驱。文明、学识和教育培育了通商所提供的各种新的必需品。”“每当一个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时，它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涉便会增加。”¹²⁹传教士何德兰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我，为美国钢铁联合企业、美孚石油、鲍德温机车厂……做宣传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我会告诉他们，赞助一两个或者十几个国外传教活动中心，一所教育机构，一家医院，一个诊所，或者100个本地传教士或教师。得到你们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成为你们的产品推销员”。1891年长江上一艘美国军舰的指挥官向国内报告说：“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金钱看来取之不尽”。¹³⁰

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亦把工作重点放在兴办教育与医疗事业上。美国伊里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直言不讳地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年青的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将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院长顾林说：“以一百美金办学校，比用两百万美元帮助军队的效力更大，军队可以叛变，学生忠诚不变”。

19世纪中叶后，法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美的状况愈益明显。第二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降为第四位，农业生产降到第九位或第十位。¹³²尤其是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支付50亿法郎的赔款，并将拥有丰富矿藏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对方，更使其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从1895年起法国经济开始复苏，但与美英德相比仍然十分落后，对华贸易数量很少。根据记载，在1866年时，来华贸易的“法国商船仅及英百分之三”，直到20世纪初，法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所占比重都是零。¹³³

因此法国积极支持天主教会在华活动，“立约之初，其悉力相争者在此；成约之后，其专心扩充者亦在此”，¹³⁴企图在精神方面得到补偿。对此，法国人也直言不讳。如鸦片战争后，法国特使拉萼尼就说：“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事情做。然而，从精神和文化方面来看，我认为该轮到法国和法国政府运筹决策和采取行动了”。¹³⁵美国当代学者柯文也说：法国“在这个帝国（指中国——引者）的商业关系是微不足道的，她主要放在对天主教的保护，以便抵消英国从比较大规模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威望和影响”。¹³⁶咸丰初年即有人指出：法国“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¹³⁷光绪中薛福成也说：“自各国立约以来，英重通商，法重传教，所操之术不同”。¹³⁸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曾公然宣称：天主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的支持”。¹³⁹而不难看出法国如此注重传教势力的扩大，是企图借助教会将法国国内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模式“移植”到中国，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并与英美匹敌。

不法传教士到底在中国占了多少地产，从局部史料看，可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永远是个谜。传教士掠夺房地产的手段是十分卑劣无耻的，据记载：“洋人爱某处住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先指为几物卖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地方不敢科以盗卖。”¹⁴⁰但是“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他们“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租屋，概凭大道生财”，¹⁴¹教会拥有房产之多，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房屋面积，有九千余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¹⁴²教会不仅是大地主，而且也是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川东主教范若瑟于同治十二年与教民同含斋伙开西法公号，垄断华商，关税厘金交受其病。¹⁴³“主教范若瑟每年都以教堂需要应用物品的名义，以领单向上海运输大量洋货入川，并包庇他人入川”。¹⁴⁴教会还通过放高利贷来攫取高额利润，例如重庆天主教堂以教案为借口勒索了15万两赔银，将其中6万两贷给巴县盐商，如果次家盐商停业或破产，须把印票优先让与教民商人。¹⁴⁵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教背景的英美，还是天主教传统的法国，他们对中国大力推行传教活动的真正目的始终是和政治、经济利益

联系在一起的，绝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就四川地区而言，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段时期，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加紧对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侵略。在政治上，帝国主义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和租界，作为侵略四川以至西南的指挥中心；在经济上，攫取海关大权、川江内河航运权，开设洋行、公司，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同时加紧向四川输出资本，开办工厂，掠夺矿权、路权，加深四川的半殖民地化；在思想文化上，以传教士为急先锋，以办慈善机构为幌子，以办学校为手段，掩盖其真实的侵略性。

但由于各国在政治构架、经济实力、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传统上的差别，又使得英国、美国和法国在川的教会活动表现出了各自的风格和特点。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头号帝国主义，也正是英国通过向中国贩卖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并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所以我们看到伴随着英国传教士的活动，英国在四川地区的商业活动异常猖獗，并获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和英国有很紧密的联系，但其当时的经济实力还无法与英国匹敌，难以直接获得如同英国那样的高额的商业利润，这使得美国更把眼光放在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上——通过让年轻的一代中国人对其文化的接受和好感来谋取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法国作为曾经的帝国已经明显衰落，为了重回过去的霸主地位并能和英美抗衡，自然也不会放过对中国利益的瓜分和掠夺。但由于其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性，在商业活动上难以和英美争夺，转而通过掠夺地产的方式以期获得经济利益的补偿，但这一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经济行为却直接与有着更长封建史的中国社会中的广大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可以说，当时法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状况加上其天主教传统的特点，使得法国天主教在川的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和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川的传教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相比，显得逊色不少。

结 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输入西方的宗教文化，即所谓的传教，是一个非常普遍也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事实证明，这样“文化入侵”的方式绝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和各个帝国主义谋取在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达到瓜分和控制中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但从另外的角度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在客观上给封闭、保守、封建文化过于厚重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思想，这其中既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为加速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该说，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传教活动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遭受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一个缩影，也是窥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窗口。

应该说国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上西方的传教活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和著述，但对于西方基督宗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教活动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多见。事实上，四川地区历来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并非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但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从1840年到1919年这段中国社会的近代史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四川地区的活动却非常发达，甚至超过了国内许多其他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全国所处的次中心地位，使得西方的传教活动可以更好地避开清政府的限制而全面展开。同时，远离全国中心区域的四川在思想文化上本来更带有保守性和浓厚的封建色彩，而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带来的却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西方思潮，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四川地区的传教活动的考察对理解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更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尝试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地区的活动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主要以二者在四川地区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以及曾经引发的教案作为研究考察的重点。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是西方传教士活动对中国社会输入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带来西方先进的技术理念的最具代表性的两项事业，而教案则是中国民众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抗争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缩影。本文首先立足从史料上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考证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川的办学及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所引发的教案冲突的前因后果，以为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材料基础。

由于篇幅和笔者能力所限，本文只是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在川传教活动中英美基督教和法国天主教的差异，以及英美法由于其自身的政治建构和宗教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华外交策略的不同。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在此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从现实的意义上来讲，中国正处于一个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诸多层面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关系，按理都可以从对这段特殊的历史的反思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希望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望学术同仁能不吝赐教，共同交流，更多深入和有价值的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展开。

注 释

- ¹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第 3 页
- ² 吴曾. 能改斋漫录 (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第 190 页
- ³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第 143 页
- ⁴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第 170 页
- ⁵ 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第 15 页
- ⁶ 嘉庆二三年巴县稟. 巴县档案
- ⁷ 天主教川南教区创立纪录. 巴县档案
- ⁸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 10 月
- ⁹ 咸丰十年十一月法国白德里传教士护照. 巴县档案
- ¹⁰ 《教务教案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致总理衙门的函文
- ¹¹ 重庆海关 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9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10 月, 第 225 页
- ¹² 隗瀛涛. 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 巴蜀近代史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6 月, 第 52 页
- ¹³ 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246 页
- ¹⁴ 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第 18 页
- ¹⁵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2 页
- ¹⁶ 川东道转发〈解毒散〉函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 709 页
- ¹⁷ 周勇.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70、142 页
- ¹⁸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文庸等译. 中华归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2 月, 第 460 页
- ¹⁹ 悟生. 排外与仇教. 四川 第一号
- ²⁰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 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 巴县档案
- ²¹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 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 巴

县档案

- ²² 鸦片烟战争后四川天主教的发展情况 抄件. 第 16 页, 转引自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第 345 页
- ²³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353 页
- ²⁴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374 页
- ²⁵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四川大学出版, 2006 年 8 月, 第 56 页
- ²⁶ 华雷士(美). 中国西部之师范教育. 见教育杂志 1919 年 8 月 20 日第 11 卷第 8 号, 转引自李楚林编.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 230 页
- ²⁷ 绵阳市中区民族事务科: 《关于基督教育哑学校在绵阳的情况》, 1988 年 6 月 10 日
- ²⁸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355 页
- ²⁹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391 页
- ³⁰ 马俊之, 刘报晖, 唐开业等编. 华西协合大学校史 1910 - 1985.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第 8、9 页.
- ³¹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四川大学出版, 2006 年 8 月, 第 16 页
- ³² 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同学总会会刊. 民国 22 年 6 月出版, 第 17 页
- ³³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四川大学出版, 2006 年 8 月, 第 17 页
- ³⁴ 重庆求精学堂实录并附录圣道学堂章程, 巴县档案
- ³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第 166 页
- ³⁶ 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宗旨. 见教育季刊 第 2 卷 第 1 期, 转引自李楚材编.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第 469 页
- ³⁷ 毕启. 华西协合大学校对于华西教育会年会报告书. 见华西教育会年会书 1922. 1922 年出版, 第 17 页
- ³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8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8 月, 第 96 页
- ³⁹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第 10 页
- ⁴⁰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升教传士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895 年, 第 295 页
- ⁴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编.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 3 辑, 1986 年 7 月, 第 131 页

-
- ⁴² 重庆博物馆藏. 川东天主教启明学堂招生广告. 转引自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年10月, 第352页
- ⁴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梓潼县委员会编. 梓潼县文史资料 第8辑, 1990年, 第128页
- ⁴⁴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 第207页
- ⁴⁵ 万国公报 1903年6月. 第137册1-4页, 转引自李楚材编.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 第419页
- ⁴⁶ 万国公报 第7卷第28号. 1905年9月, 转引自李楚材编.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 第236页
- ⁴⁷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资料 第29辑. 成都出版社, 1996年3月, 第242页
- ⁴⁸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资料 第29辑. 成都出版社, 1996年3月, 第247页
- ⁴⁹ 董宝良. 中国教育史纲(近代部分).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年
- ⁵⁰ 康有为. 大同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年
- ⁵¹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 ⁵² 四川教育官报·公牍[J], 己酉第九册, 1909年
- ⁵³ 重庆海关 1902——1911十年调查报告. 见四川文史资料 第11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4年3月
- ⁵⁴ 重庆海关 1912——1921十年调查报告. 见四川文史资料 第12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4年4月
- ⁵⁵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8), 第327页
- ⁵⁶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1), 第434页
- ⁵⁷ 罗苏文.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第196页
- ⁵⁸ 成都博爱圣修医院. 四川卫生史料 总第5期, 转引自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 见隗瀛涛. 巴蜀近代史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
- ⁵⁹ 陈媛. 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 中华医史杂志 2006年1月第36卷第1期
- ⁶⁰ 陈媛. 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 中华医史杂志 2006年1月第36卷第1期
- ⁶¹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419页
- ⁶²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425页
- ⁶³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430页
- ⁶⁴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年, 第431页
- ⁶⁵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12月, 第275页
- ⁶⁶ 简阳县志 卷二十二, 礼俗篇, 第22页A, 转引自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
-

- 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第 358 页
- ⁶⁷ 周勇.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70 页
- ⁶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12 月, 第 191 页
- ⁶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编.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 3 辑. 1986 年 7 月, 第 119 页
- ⁷⁰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 10 月, 第 54 页, 第 62 页
- ²⁹ 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 10 月, 第 91 页, 第 106 页
- ⁷² 四川档案馆编.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48 页
- ⁷³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第一册, 第 44 页
- ⁷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邛崃县委员会编. 邛崃文史资料 第 6 辑. 1992 年 10 月, 第 190 页
- ⁷⁵ 巴西尔著, 汪宏声译. 美国医生看旧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第 197 页
- ⁷⁶ (英) 立德著. 刘云浩 王成东译.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138 页
- ⁷⁷ 马伯英等著.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文汇出版社, 1993 年, 第 328 页
- ⁷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12 月, 184 页
- ⁷⁹ 民国巴县志. 第 16 卷: “交涉”, 转引自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398 页
- ⁸⁰ 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400 页
- ⁸¹ 隗瀛涛. 四川近代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115 页
- ⁸² 近代史资料 第 1 卷.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129—130 页
- ⁸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末教案 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98 年, 第 544 页
- ⁸⁴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藏稿, 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46 页
- ⁸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末教案 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98 年, 第 891 页
- ⁸⁶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第 45 页
- ⁸⁷ 《教案与近代中国》第 118 页, 超星
- ⁸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7 辑. 四
-

川人民出版社, 1965 年, 12 月. 第 110, 111 页

- ⁸⁴ 卿汝揖. 美国侵华史 第 2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56 年, 第 616 页
- ⁹⁰ 卿汝揖. 美国侵华史 第 2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56 年, 第 616 页
- ⁹¹ 艾学. 帝国主义与宗教. 转引自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447 页
- ⁹² 重庆江北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所谓“江北教案”, 转引自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 年, 第 486 页
- ⁹³ 四川大学史稿编委会.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四川大学出版, 2006 年 8 月, 第 11 页
- ⁹⁴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四川省志·宗教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270 页
- ⁹⁵ 宣统元年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 巴县档案
- ⁹⁶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期. 第 12 卷,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22 页
- ⁹⁷ 李时岳. 甲午战前三十年间反洋教斗争. 历史研究. 1958 年第 6 期
- ⁹⁸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第 166 页
- ⁹⁹ 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第 365 页
- ¹⁰⁰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教务教案档(第 1 辑).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年, 第 778 页
- ¹⁰¹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教务教案档(第 1 辑).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 年, 第 779 页
- ¹⁰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20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39 页
- ¹⁰³ 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期),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366 页
- ¹⁰⁴ (英) 立德著. 刘云浩 王成东译.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134 页
- ¹⁰⁵ (英) 立德著. 刘云浩 王成东译.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138 页
- ¹⁰⁶ 王明伦选编.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10 页
- ¹⁰⁷ 讨西洋教匪檄文. 王明伦选编.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79 页
- ¹⁰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20 辑. 四

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45 页

- ¹⁰⁹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第 401 页
- ¹¹⁰ 马克思 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251 页
- ¹¹¹ 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592 页
- ¹¹² (英) 立德著. 刘云浩 王成东译.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华书局, 2006 年, 第 77 页
- ¹¹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25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48 页
- ¹¹⁴ 钟祖芬. 振振堂文稿. 民国刻本文稿, 转引自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第 172 页
- ¹¹⁵ 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 第 7 页
- ¹¹⁶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转引自 *The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 第 1261~1264 页。
- ¹¹⁷ 宓克著. 严复译. 支那教案论. 上海南洋公学译院, 1899 年, 第 58 页
- ¹¹⁸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自供.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424 页
- ¹¹⁹ 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第 232 页
- ¹²⁰ 隗瀛涛主编. 四川近代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 第 93 页
- ¹²¹ 四川简史编写组. 四川简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6 年, 第 226 页
- ¹²² (英) 华特生. 重庆海关 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470 页
- ¹²³ 光绪嘉定县志第 8 卷, 第 15 页,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470 页
- ¹²⁴ 朱士嘉. 19 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 中华书局, 1959 年
- ¹²⁵ 阎广耀、方生选译.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64 页
- ¹²⁶ 阎广耀、方生选译.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85 页
- ¹²⁷ (美) 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第 415、451~454 页
- ¹²⁸ 阎广耀、方生选译.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20 页
- ¹²⁹ 阎广耀、方生选译.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超星数字图书馆, 第 365、366 页
- ¹³⁰ (美) 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第 375、376 页

- ¹³¹ 国际宣教评论 第 37 卷, 第 144、488 页, 转引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第 41 页
- ¹³² 夏炎德. 欧美经济史. 三联书店, 1991 年, 第 452—456 页。
- ¹³³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 第 65 页
- ¹³⁴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教务教案档 第 1 辑. 台北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64—1981, 第 81 页
- ¹³⁵ (法) 卫清心著、黄庆华译.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第 316 页
- ¹³⁶ (美) 柯文著. 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 (1860-1870).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3 年
- ¹³⁷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4 卷, 转引自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 年, 第 128 页
- ¹³⁸ 薛福成. 庸庵海外文编 第 1 卷, 第 25 页
- ¹³⁹ 史式徽. 江南传教史 第 2 卷, 第 180 页
- ¹⁴⁰ 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第 4 期, 第 7 页
- ¹⁴¹ 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75 页
- ¹⁴² 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74 页
- ¹⁴³ 同治十二年七月九日, 总署收成都将军魁玉函. 见教务教案档 第 3 辑 第 2 册, 第 946 页
- ¹⁴⁴ 史学月刊. 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编辑出版, 1957 年第 5 期, 第 23 页
- ¹⁴⁵ 张力. 四川义和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第 13 页

致 谢

本文是在导师鲜于浩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读研期间，一直得到鲜于浩教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在此，谨向尊敬的导师鲜于浩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同时，导师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使学生在将近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受益非浅，并将一直激励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进取！

感谢同学胡伟伟、袁天亮、严安全、李伟魏、庞启浪对作者论文写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最后，作者对给予自己支持和关心的所有师长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一 史料

- [1] 嘉庆二三年巴县稟. 巴县档案
- [2] 天主教川南教区创立纪录. 巴县档案
- [3]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年10月
- [4] 咸丰十年十一月法国白德里传教士护照. 巴县档案
- [5] 教务教案档.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致总理衙门的函文
-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3年10月
- [7] 四川省档案馆编.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8] 刘吉西等编. 四川基督教. 巴蜀书社, 1992年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华归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2月
- [10]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 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 巴县档案
- [11] 李楚林编.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
- [12] 绵阳市中区民族事务科. 关于基督教育哑学校在绵阳的情况. 1988年6月10日
- [13] 重庆求精学堂实录并附录圣道学堂章程. 巴县档案
-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17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5年12月
-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8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3年8月
-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委员会编.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 1986年7月
-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梓潼县委委员会编. 梓潼县文史资料 第8辑. 1990年
- [18] 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成都文史资料 第29辑. 成都出版社, 1996年3月
-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11

-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3 月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12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
- [21]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商务印书馆, 1914 年
-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邛崃县委员会编. 邛崃文史资料 第 6 辑. 1992 年 10 月
-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20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 [24]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 [25]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四川省志·宗教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26]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教务教案档(第 1 辑). 台北精华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64—1981 年
- [27] 王明伦选编. 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超星数字图书馆, 1984 年
- [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25 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29] 朱士嘉. 19 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 中华书局, 1959 年
- [30] 阎广耀、方生选译.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 超星数字图书馆, 1990 年
- [31]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

二 著作

- [1]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 [2] 吴曾. 能改斋漫录 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 [3] 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 [4] 隗瀛涛. 巴蜀近代史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6 月
- [5] 周勇.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超星数字图书馆
- [6]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 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 四川大学出版, 2006 年 8 月,
- [7] 马俊之、刘报晖、唐开业等编. 华西协合大学校史 1910 - 1985.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 [8]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 [9]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升教传士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895 年
- [10]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 [11]董宝良. 中国教育史纲(近代部分).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 [12]康有为. 大同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6 年
- [13]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年
- [14]罗苏文.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15]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
- [16]巴西尔著、汪宏声译. 美国医生看旧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 [17](英)立德著、刘云浩 王成东译.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中华书局, 2006 年
- [18]马伯英等著. 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文汇出版社, 1993 年
- [19]张力、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1987 年
- [20]隗瀛涛. 四川近代史. 超星数字图书馆, 1985 年
- [21]近代史资料 第 1 卷. 超星数字图书馆
-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清末教案 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98 年
- [23]教案与近代中国. 超星数字图书馆, 1990 年
- [24]卿汝揖. 美国侵华史 第 2 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56 年
- [25]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等编. 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 [26]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
- [27]马克思、恩格斯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28]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 时务报馆代印本
- [29]宓克著、严复译. 支那教案论, 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 1899 年
- [30]四川简史编写组. 四川简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6 年
- [31](美)孔华润主编、王琛等译.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 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 [3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 [33]夏炎德. 欧美经济史. 三联书店社, 1991 年
- [34](法)卫清心著、黄庆华译. 法国对华传教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35](美)柯文著. 中国与基督教: 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 (1860-1870).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3 年
- [36]史式徽. 江南传教史 第 2 卷
- [37]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5 年
- [38]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

三 论文

- [1] 陈媛. 近代重庆宽仁、仁济教会医院. 中华医史杂志, 2006 年 1 月第 36

卷第 1 期

[2] 李时岳. 甲午战前三十年间反洋教斗争. 历史研究, 1958 年第 6 期

四 报刊

[1] 梧生. 排外与仇教. 四川第一号

[2] 史学月刊. 河南大学河南省历史学会编辑出版, 1957 年第 5 期

蒲娟 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戴高乐外交策略评述.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7, 第 8 期

声 明

本论文所引用的他人论点和相关文献，均已一一注明出处。
由本文本身而引起的版权纠纷，由撰写本人负完全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